

傾聽公民力：  
改變印度社會的新力量

Dr. Vinod Raina (文諾·瑞納博士)

引言 (劉健芝老師)：

文諾博士當年讀書的時候，跟現在的年輕人一樣，很想去攻讀物理。他那時也認為科學是最為發達與先進的東西，他在印度讀完物理學並拿到了博士。但是他沒有像很多當時的年輕人一樣跑到外面去，當時的潮流是大部分畢業的學生都會跑到美國去了。他沒有到美國去，留在了印度。從 1975 年到 1986 年，他在印度的新德里大學教書，就教 11 年，教書的同時，參與很多社會運動，其中一個比較重要的，也是他一直堅持到現在的，是 1982 年成立的組織，叫 Eklavya。

Eklavya 是個什麼組織呢？它是一個推進小孩與老師的全面教育的組織。剛才我們休息的時候，我問文諾 Eklavya 是什麼意思？他說這是印度一個傳說故事。說的是一個原住民小孩，看到一個老師教弓箭，但是他教授的都是王孫子弟。小孩子很窮，站在旁邊，說他想學。但是老師說，這個不是給你學的。過了幾年，老師帶著他這幫貴族子弟去森林玩的時候，看到一個年輕人，弓箭技術非常的好。他很奇怪，問年輕人，你是怎麼學的？年輕人說，師傅，幾年前我想跟您學，但是您沒有教我，我偷偷的拿了你的鞋子，向它祈禱，然後我就自學了。老師覺得出問題了，因為他這些技術是要教給有地位的人，不是窮人。於是他問年輕人，那我是不是你的師傅？年輕人回答說是的。他對年輕人說，既然我是你的師傅，你要送我一樣禮物，我要你的右手大拇指。於是就把年輕人的右手大拇指給切了，就是不想讓他再有能力拉弓。但是年輕人儘管沒有了大拇指，仍然練習用他

的中指與食指來拉弓。今天他們說在印度有一個叫薩瑪帕德的地方，還是有一個原住民部落是用這樣的方式拉弓射箭的。

文諾他們當年想了一年才想好他們的組織叫什麼名字，就叫 Eklavya，強調通過自學掌握知識。他們經常跟村民講這個故事，問村民，如果你是那個小孩，你會怎麼樣？師傅要你把大拇指割下來，你會怎麼做？一會文諾演講的時候，我們會聽他講更多精彩的故事。

1982 年成立 Eklavya，工作包括很多方面。他們辦了三個雜誌，一個是給小孩的，我聽他們說他們辦這個雜誌，會有很多小孩的來信，他們每一封小孩的來信都會回復，或是刊登在雜誌上；第二個雜誌是給教師的，讓教師怎麼樣更好的改善教育；第三個雜誌是做新聞專題，分批做報導，二十幾年來他們一直堅持做著這個事情。

文諾博士不僅僅編雜誌。他住在博帕爾，大家可能聽過 1984 年博帕爾 Bhopal 一個工廠發生洩漏化學毒氣的事件。從那個時候開始，他一直幫助受害者爭取權益，爭取補償，還有爭取政府在法律政策上的改變，要限制跑到印度來的重污染的工廠。1986 年，文諾博士參與了反對納爾默達水壩 Narmada Dam 的運動，這個運動也是一直堅持著。因為反對納爾默達運動，他跟水利專家和保護水資源的人與組織有很多聯繫，也認識了鐘秀梅等很多這裏的朋友。1989 年，他們提出，如果說我們印度要現代化的話，識字運動是必要的，因為我們的文盲率那麼高，政府做了幾十年，要大力推動掃盲運動，但總不成功。當時他們跟政府說，我們提議由我們幫忙搞掃盲運動，動員志願者，每個志願者要給學員上一年的課，每週一天或者兩天，每個志願者要幫十個人掃盲。從 1989 年開始，他們特別成立了一個組織叫 BGVS (Bharat Gyan Vigyan Samiti)，就是“印度知識與智慧”運

動。從那開始，他們在印度總共動員了一千二百萬志願者，給一億五千萬人掃了盲。因為運動這麼龐大，而且這麼有效，1996 年，他們聯盟其中一個團體“喀拉拉民眾科學運動” 獲頒優秀民生獎 (Right Livelihood Award)。

文諾博士幾十年如一日，在大量的農村裏面跑，做推廣民眾科學運動的工作。他同時也參與了國際性的大聯盟活動，他是“世界社會論壇”國際委員會委員，也是一個國際性的運動“南方取消債務組織” Jubilee South 的國際委員會委員，也是“印度科學作家協會”成員。他們作為民間組織，跟政府有很多合作，文諾博士也曾經擔任“印度國家教育改革委員會”委員。

接下來，我簡單的介紹民眾科學運動開展的一些活動。民眾科學運動是 1987 年發起的。全印度有 28 個邦，1987 年，印度 18 個邦成立了 26 個民眾科學運動的組織，聯合成立“全印度民眾科學運動聯網” All India People’ s Science Network，到今天，在 22 個邦裏面有 56 個組織參加民眾科學運動的聯網。他們推行了很多改革，包括在 1972 年，成功跟政府合作，做了一個關於小學教育的改革，讓小學的孩子快樂學習，學習的知識跟生活更有聯繫。2005 年以來，他們推動成立了 1100 個社區學校，這些社區學校是正規的學校，但是學校的經費、師資等全由社區自行負擔，自行監督，自行執行。另外，他們非常重要的工作是關於地方自管 local governance。地方的自管不簡單涉及行政系統，也包括怎麼結合當地的經濟、政治、文化的發展。為了這個工作，他們需要的不僅是制度上的改革，還需要有人才參與到地方的治理。所以他們從事大量的培訓志願者的工作。舉個例子：從去年開始到今年年底結束，他們在 1500 個鄉（鄉人口大概有三千到五千人），每個鄉培訓 8 名年輕人，讓這些年輕人有能力在鄉里做各方面的工作。從明年一月份開始，他們有一個三年的計畫，就是要在全印度 5 萬個

鄉，每個鄉培養 6 男 6 女，總共是 12 名年輕人，希望在未來地方治理上培養 60 萬人才。他們給這些年輕人的培訓課程包括全球化對印度的影響，怎麼看待鄉里面的人力與自然資源，怎麼利用這些資源以及它受到了什麼樣的破壞，也包括四個專題：醫療健康、就業、取得資訊的權利、教育。民眾科學運動大概有 1000 人下鄉推動培訓。從 1995 年開始，幫忙成立了很多婦女互助小組，直接解決生計問題，到現在為止，在全印度，總共成立了二萬七千個婦女互助小組，參與的大概有 40 萬婦女。

民眾科學運動的做法，是怎樣讓更多的人參與，能幫助他們更好的使用各種適用技術。全印度的民眾科學運動，總共動員約 50 萬志願者，全職人員卻只有 80 人。看數字，我們會驚歎運動如此龐大，可是文諾博士會說，如果規模不大，怎麼能進行有效的改革？可是，我們看到的不止是這種規模，我們還看到的，是他們很用心、很細緻的、不懈的努力。

現在請已經從事幾十年民眾科學運動的文諾博士分享他們的故事。

**正文：文諾博士：**

非常榮幸今天能來到這裏，也非常感謝天下雜誌和浩然基金會給予機會在這裏分享一些故事。在聽眾裏面，有很多我的老朋友，比如從秘魯來的石澤宏博士 Jorge Ishizawa，從墨西哥來的路宜思先生 Luis Lopezllera，香港來的劉健芝博士，也有很多有過接觸的人，比如在過去三天裏面在一起的六十個非常有趣的人。在這裏我們一起為浩然基金會的努力鼓掌！

我喜歡跟叫 Common Wealth（“天下”）的雜誌合作與交往。Common Wealth 這個字眼在過去是跟英國的殖民地聯繫在一起的，今天這些前英國殖民地被稱為

Common Wealth countries，所謂共協國家，是跟英國的殖民歷史聯繫在一起的。我問“天下”雜誌的工作人員，Common Wealth 是什麼意思？他們告訴我是共有資本，也就是普遍財富的意思，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好的、非常有趣的詮釋。我想在地球上的每個人每個生物都有權利共用我們共同的財富，共同的資源。今天這樣的共用共有財富的體制受到了很大的挑戰。包括水資源，包括很多自然資源，現在都逐漸隨著私有化成為某些個人、企業的私有財產。這是我們今天要面對的很大挑戰！

我們今天面對著一種典範的說法，就是說這個世界的財富與知識是可以被私人所壟斷的。我覺得這樣一種私有化的想法跟所謂的 Common Wealth 的想法是完全相反的。反對私有化的力量在印度是非常小的，主流的力量仍然是在推動私有化。浩然基金會的努力是非常值得讚揚的，在過去三天，把我們組織起來，做了一個工作坊，我們能夠見到臺灣的活力。我對自己一個人在這裏代表著這份榮譽，覺得很不自在，因為我所代表的運動在印度至少有 50 萬以上的人參與。所以不只是我一個人的努力。我在這裏代表著我們 50 萬人的努力。

印度是個大國。不好意思，我想講一下數字。我問人家說，臺灣有多少人？有人告訴我是 2300 萬，他覺得這是一個有意思的、非常好的地方，我問路宜思墨西哥市有多少人？他說墨西哥市有 2000 萬人。印度有 10 億人，當然中國比印度還要多一些。我們可以想像一個有 10 億人的國家的情景。我希望有一天來臺灣，來到一個只有 2300 萬人口的地方居住。印度是貧富差距很大的地方，好的很好，差的很差。在印度，沒有一個時刻是無聊的。在印度你經常可以看到一個很漂亮的建築，旁邊就是貧民窟。你可以看到很富有的人，也可以看到連飯都吃不飽的人；印度有很多美食，但是也有人連基本的食物都沒有。

我有時候去日本旅行，老實說，在日本的時候我覺得有點無聊。很多東西一模一樣，日本是我知道的最單一文化的國家，全國各個地方都是同樣的語言，同樣的種族，同樣的建築，同樣的豐田汽車。在印度，我們使用的語言種數就有 467 種，其中 80 種是官方語言。我只會講 6 種語言，所以我到很多地方去的時候，根本沒有辦法跟他們說話。我到臺灣來，雖然我不懂中文，就像在印度我到很多地方去，我也不懂他們的語言，但是我不會覺得不懂得的語言是很麻煩的事情。所以在這樣的一個社會裏面，我們學會用各種辦法溝通。同時我們也會被引導去學習很多語言，我懂這些語言並不是我被教導要學習這些語言，而是你要跟人溝通，你就需要這些語言。

當我們談到民眾科學，很多人會覺得奇怪，科學跟人民有什麼樣的關係？科學不是跟電腦、手機和戰爭的武器等高科技武器連系在一起的嗎？那麼為什麼我們要有一個民眾科學運動？科學和人民有關係嗎？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為什麼我們要叫做民眾科學運動？我們叫做民眾科學運動，是因為一開始宣導這個運動的很多人是專業專家，有核電專家，有醫生或工程師。科技是一個高度爭議的領域，我們的生活被科學與技術圍繞著，我們每天都面對很多科學與技術的問題，不管是在概念上，還是在現實生活上。我們所詮釋的科學，不只來自於實驗室、大企業或大學，科學是每一個人在不同場合所應用的技能，包括在農田、在家庭、在每天的生活裏，都是科學。比如說，農業作為一種科技，已經有一萬年的歷史，那麼農民使用農業科技如育種、種植等等這些都是一萬年以上的實踐。在還沒有“科學家”的時候就已經有這樣的科技。比如說在廚房裏，你必須瞭解熱力學的一些原理，如何煮一鍋湯？如何使用熱源？這個實際上跟化學是一樣的，只不過我們沒有把它稱之為化學，所以我們說每個家庭主婦每天都在重複的

在做化學實驗。我可以談很多與廚房有關的科技，比如家庭主婦如何使用熱源，如何挑選各種材料，如何使用這些材料。還有，我們通常只是隨手把它們稱之為手藝的這樣一個領域，有許多手藝人，有各種各樣技能，所以我們說這個世界上科學的實踐是有人類以來就一直持續著。

民眾科學運動結合了人民的庶民知識以及所謂的標準知識，也就是現在科學所教的標準科學。我們反對科學裏面壞的面向，我們反對戰爭，我們反對核子武器，我們反對在我居住的城市裏殺死了兩萬五千人的毒氣，這些是科學特別的一面。另外一方面，科學是看待世界的一種方法，科學是一種好奇心，所以科學是一種想像，科學是一種藝術。比如說音樂裏面有大量的科學原理，大部分的音樂都有數學的結構。科學是一扇向世界打開的窗戶，跟美學、跟藝術、跟生產都聯繫在一起，然後結合成某個完整的知識體系。所以科學的實踐也可以是為了人民的共同福祉，這是我們民眾科學運動如何看待科學的論述。

我們許多工作人員是從實驗室或大學辭職，全身心投入到這個運動裏。因為在大學裏面，在實驗室，我們不可能控制我們的生活，這些機構可以用我們的知識與技能來做炸彈，做對人民不好的東西。我們這些科學家對這樣的事情卻沒有任何控制能力。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要從這些機構辭職來發展我們的運動，讓我們自己的技能與知識能真正為人民服務，而不是為這些機構服務。所以民眾科學運動非常重要的精神是，直接跟人民一起工作。

民眾科學運動最早是從印度南方喀拉拉邦開始的，運動一開始只是說我們試著把科學知識翻譯成本地語言。印度很多地方，沒有本地語言所寫的科學教科書與科學材料，所有教育語言用的是英語。1962 年開始了這個運動，開始把科學介紹給只懂本地語言的人。我在 1972 年開始參與民眾科學運動，開始時做兒童

的科學教育。那些兒童是在農業與手工藝為基礎的村莊裏面長大，我們希望能把他們的知識跟標準科學知識結合起來，去發掘他們的本土知識跟標準知識的聯繫，然後有機的連接起來，希望能打造所謂的有機知識份子。

剛才劉健芝教授介紹我的時候提到一些很重要的事實：1984 年在博帕爾發生的、在和平時期裏面科學技術屠殺最多人的的一個事件，有兩萬五千人被殺。因為毒氣的外泄，成千上萬的人還在承擔著那次毒氣洩漏所造成的後遺症，包括咳嗽、肺功能、眼睛的問題等等。但是該企業使用了各種各樣方式擺脫了事件的責任。所以民眾科學運動必須面對這樣的情況，要試圖參與進來，介入民眾與科學之間的問題。除了人為災難，自然災難是不斷的，我們需要告訴人民如何去面對這些災難，譬如說我們告訴人民如何建造堅固的房子去抵抗颱風與海嘯，因為自然災害是對大多數的貧窮人造成最大的傷害，因為有錢人多半會住在安全的地方。譬如我們也參與了反對興建納爾默達大壩的運動，為了這個大壩，有 20 萬人被迫離開他們的祖居地，而且我們發現整個大壩在技術上的設計是錯誤的，這個大壩所承諾提供的電，提供的水的設計都是錯誤的，這個運動發展成了被驅逐的民眾的運動，我們也參與到這個運動裏面，我們民眾科學運動提供一些技術上的資源，然後一起上訴到印度的最高法院。這些大致就是我所參與的一些運動。

1987 年，我們建立了一個全國性的運動聯盟網路，這個時候，我們大約有十萬個志願工作人員。我們並不是要取代政府的功能，我們相信政府是應該負起它的責任的。我們的運動是要求政府做它本分的事情，我們提供教育並不是取代教育部的功能，而是要求教育部門去推動這些東西，我們也有一些示範的工作去顯示我們所要求的科學教育是可以推行的，要求教育部推行同樣的對人民有益的科學教育。我們一個很重要的工作是推動成人教育，我對臺灣的社區大學有些瞭

解，我覺得非常有意義。我們需要擴張我們的影響力，開展廣泛的成人教育。我們在這裏談的掃盲運動，不僅是認識字而已，也包括對住宅問題的瞭解，對水源問題的瞭解，以及對整個世界的瞭解。在這裏我是用巴西的教育家鮑羅·菲理 Paulo Freire 對於識字運動的定義，不只是識字，不只是瞭解語言，而是對整個世界的認識，瞭解農業，瞭解水等等。我們後來成功推動政府進行成人教育的建設，我們也被邀請進入教育部門配合一些設計工作。

我們有示範性的工作，顯示我們有組織能力組織我們的志願者，而我們的志願者組成跟原有教育系統完全不一樣的教育體系。在教學法上，事實上你不應該對人民做一個標準性的科學的演講，這樣的演講是沒有藝術的，我們的方法應該是要觸動人心。民眾科學運動一開始採用的方法，就是 Kalajatha 的方式，那是一個巡迴表演的文化宣傳隊，民眾科學運動的團體用最普及的音樂，從一個村到另一個村去表演，這些表演必須要跟當地人關心的議題聯繫在一起，村民看了以後就會說，你們談的事情跟我們關心的是一樣的，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在村子裏面組織委員會來解決共同的問題。很多人說我們把很多事情都混在了一起，你們把科學、劇場、音樂混在了一起，你們都搞混了，但是事實上，生命本來就是各種元素混合在一起的，所以我們這樣的工作方法成功動員非常多的人。到了 1998 年，我們有 120 萬志願者，許多是女性，用自訂的教科書做掃盲工作。參與工作的女性也有組織婦女互助小組，幫助婦女小組成員解決生計、衛生等等切身相關的問題。

現在我要讓大家看一段影片，看一下巡迴表演的文化宣傳隊的工作方法，這是印度“科學與智慧運動”的志願者從事的一些工作。

**[播放影片]**

剛才的影片讓大家理解到一些我很難用語言描述的一些我們工作的情景。當有些人問我，你們的計畫是怎麼樣做的，那是很難回答的問題，因為一般都是人民自己做計畫，而不是我們做計畫。有可能說在一些村莊裏面，他們也許會認為水源的問題是個大問題，所以他們會成立一個水源問題委員會，然後我們會提供各種各樣的協助。這並不像一個 NGO 進來推動他們的業務計畫那樣，而是人民做他們自己的計畫，我們的組織提供資源。

比如說在印度的喜馬拉雅山區，有很多果園，水果的生產往往會很浪費，因為他們要把水果從果園運輸到城市，需要非常多的時間和資源，我們試圖幫他們設計，看有沒有可能有水果加工工業，所以在當地我們建立了一個非常巨大的由人民來自己經營管理操作的水果加工工業，這也是人民所需要的。

在另一個地區，當地生產很多皮革。印度教不吃牛，但牛死後，皮可以製成皮革。在過去，皮革的製造往往由幾個公司壟斷，所以我們就讓當地的村民自己做村裏面的皮革加工，由村民組成的合作社把皮革製作成非常美麗的皮革產品。

南印度有一個很大的問題，是家庭暴力問題，有很多家庭暴力問題是工人下班之後喝了酒，失控之後打妻兒。南印度的安德拉邦，有 50 多萬女性走上街頭，要求禁止土酒的生產。這 50 萬女性之所以能組織起來，就是由於我們的掃盲運動，她們成功的迫使邦政府禁止在當地生產烈酒。所以只要我們能夠把人民組織起來，他們就可以產生自己的力量，我們所從事的運動的方式是非常非常多的。

當我們反對大壩這樣一個工程的時候，政府會挑戰我們說，你們反對我們的計畫，那麼你們的另類計畫是什麼？所以我們必須要制定我們自己的另類計畫，比如說，我們如何收集雨水，如何經管整個地區的自然資源。雨水如何能被保存

起來，如何作為民生用水所使用，這是我們科學計畫的一個部分。

最大的一個機會在 1994 年出現，我們的掃盲運動已經進行了一段時間了。1947 年印度獨立的時候，印度的獨立跟中國的革命非常不一樣，中國是一個革命性質的運動，在印度不是這樣，是一個非暴力的改變。甘地對印度的獨立有非常大的影響，甘地是非常反對英國式的議會民主的，他還專門寫了一本書談論他為什麼反對議會民主。他有一個另類的想像，他認為議會不應該在省或者是城市，而應該在村莊，如果一千人有一個管治機構（政府）的話，這個機構是不大可能被腐化的，因為一千多人可以直接的監督這個管治機構的施政。但如果這個政府代表一百萬人的話，那麼這一百萬人需要通過代表來監督這個政府，所以這個政府就有了腐化的機會。甘地推動一個叫村莊議會的運動，他把這樣的議會稱之為 Panchayat，是一個聚會所的意思。很不幸，印度獨立制憲的時候，這樣的議會制度並沒有被放進印度的憲法裏。1994 年，印度修憲的時候，村莊議會這樣的一個制度被放進了憲法。1994 年，除了全國與省級的議會以外，當年的修憲還規定了設立縣、鄉、村的三級議會，憲法還規定，鄉村議會必須有 33% 的代表是女性。1994 年，民眾科學運動認為這是一個重要的革命，人民不只是可以控制自己的財政預算，做自己的發展計畫，而且可以自己動手來做，所以我們跟新設立的鄉村議會有各種各樣的合作。

比如說在喀拉拉，我們跟一些鄉村議會合作做五年計畫，建立鄉村的教育系統、灌溉排水系統、整個農村的規劃等等。我們推動這樣的本地規劃。我們所推動的九個五年計畫，在喀拉拉有 1232 個鄉村議會採用。我們跟這些鄉村議會緊密合作，包括在教育、婦女工作、衛生等方面。我們現在推動的計畫是在五萬個鄉村議會施行的，每個鄉村大約培訓五千人，所以你可以想想，參與的人有多少。

我們為每一個鄉村議會訓練 12 個種子師資，6 男 6 女。種子師資必須有新的想法，跟當地的生計與生活有關的想法，一些另類的想法。我們的工作就是提供這樣的訓練，讓全國成千上萬的人可掌握自己的命運，做自己的計畫，現在狀況比較好的是這些鄉村議會可以有自己的預算。當有些鄉村議會要在村子裏推動有機農業，你並不需要一個外來的 NGO 去提供任何資源，它自己就可以有財政預算，自己就可以使用，可以在自己村子裏面推動有機農業計畫。

比如喀拉拉邦一個叫阿金瑪德 Plachimada 的村子，可口可樂公司向政府買了一塊地，我們很奇怪，為什麼可口可樂公司要在當地買一塊地，原來它並不需要地，它需要地底下的水資源。他們在那塊地上挖了一個深井，然後抽水做可口可樂。當地的鄉村議會反對這樣的做法，但可口可樂公司認為上級的邦政府已簽了協議，把那塊地撥給了可口可樂了，可是鄉村議會否決了上級政府的決議，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案例。鄉村議會與邦政府之間的力量對比是怎麼樣的？在這個案例裏，有趣的是地下水並不只在這個村子裏，而是在整個大區域裏在流動，那到底是誰有權把地下水給誰？是邦政府有這個權力還是鄉村議會有這個權力？這個爭議最終還是要回到一個問題：共有財富的問題，到底誰掌握共有財富？是社區？是村落？是鄉村議會？是邦政府？還是全國政府？現在反對把共有財富私有化的運動已經非常強大。對於可口可樂公司，在美國有 32 所大學校園禁止可口可樂進入他們的校園，因為他們聽到可口可樂是如何在印度當地搶奪地下水的這樣一個案例，所以他們決定支援印度的村民，才有了這麼一個針對可口可樂的抗議活動。

當有人問我們，你們如何讓那麼多人參與到你們的運動裏面去，你們的資源，你們的錢從什麼地方來？我們並不是什麼 NGO，我也不喜歡 NGO 這個詞。因

為為人民的共同福祉服務並不是 NGO 的特權。任何一個人、一個大學教授、一個家庭主婦、一個政府都可以做這些事情。我並不認為 NGO 可以壟斷做好事的機會，這樣的機會也應該由所有人共用。關於我們的資源這個問題，我的回答是第一我們不從外國的基金會、外國的財源拿錢。當然我們也會接受資助邀請出去參觀訪問，但是我們的工作不會接受用外國的資源來做我們的計畫。我們會接受政府的資助，因為我們相信政府的錢都是納稅人的錢，應該用來做公共事務。

例如我們現在很多村莊推動的另類學校，並不是一個體制外的學校，而是體制承認的學校。但事實是，在這些村莊裏，很多村民沒有能力交學費，那怎麼辦？我們的解決辦法是這樣的，比如是一個種麥的村民，他可以用兩包麥子來交學費，他可以用一擔青菜來交學費，我們可以用這些食物給教職員吃，所以我們可省下很多花費，可以不用出去向基金會申請錢。所以我們的學校計畫裏面，60%的經費來自于社區本身。另外 40%從其他地方募款。2000 年到 2005 年，印度的聯邦政府是由一個宗教原教旨主義教育派控制的，他們反對我們的工作，把我們的經費通通砍掉。在整個學校運動裏面，我們總共有 80 人每個人每月領 10 美元的補助，其他人完全是志願的。就是因為有大量的志願者投入，彌補了我們在資金上的不足。

我要告訴在香港、臺灣這樣的工業化地區的人，在全世界不只是有一個希望的島嶼，而是有一個希望的海洋，關鍵是你怎麼樣把像海洋一樣廣大、一樣有希望的人民聯繫在一起。我們的經驗是，你只要把這樣的希望由有另類未來的人連接起來，就會產生希望，他們看到外面來的人帶來的新的想法，激發了其他的想法，會願意把命運掌握在自己手裏。我們可以看到現在世界上有也許 10 億人希望說把共有的資源掌控在自己手裏，但是另外有 50 億人不希望共有的財富給少

數人掌控，所以我們的挑戰是如何讓 50 億人發出他們的聲音，我們需要一個另類全球化，一個全球性的希望的連接。我希望我的分享能對大家有一些用處。

**討論部分：**

**劉健芝：**

我們要追求什麼樣的生活？我們要有熱情去追求這樣的生活，而且這種生活不是個人的。但是現在不管是我們的教育還是社會上的競爭，要求的都是尋找自己的未來之路與前途，而社區的未來是與自己無關的。剛才我們分享到了，在印度的民眾科學運動裏面，沒有一個英雄，但是讓每一個人都扮演主角的角色，我想這也是他們嘗試用他們的行動、他們的實踐去定義新的民主與正義，每個人可以為自己做主，為自己所在社區的發展做努力。所以我們可以看到他們的工作中有很多非常有創意性的、如文藝巡迴隊的工作方法。他們在村莊所做的工作有自己的創造性，並不是週末開個演唱會，而是大家都參與其中，一起以戲劇與文化的創造性方法來表達他們的生活關注。他們不簡單是一個反對的運動，而是通過參與來建設他們的社區。他們不簡單是一個反水壩運動，而是如何利用水資源和保護資源的運動。下面我想邀請鐘永豐局長做回應，大家有什麼提問，可以寫在提問單上，我們一會收集儘量回答大家的問題。請鐘局長。

**鐘永豐：**

各位朋友，大家好！首先，我必須要說明，我還沒有那麼大的能力回應文諾博士的想法與實踐，我只能分享一點我的感受。首先，我很感謝文諾能來臺灣，也很慶倖我能領悟文諾的部分想法，我在想，如果早個七、八年的話，我在台下

聽演講，我會很直接的說，這個臺灣的形式不是這樣，所以印度的這一套大概也不會適用於臺灣，我會有這樣一個下意識的想法出來。我這幾天很幸運能跟他有所接觸。我發現文諾在整個運動的過程中十分的強調整體性，這個整體性包括從知識到理性，這個知識包括大學知識與地方知識的結合，這種整體性的結合不是來自於非常機械的結合，而是來自一個開放的心胸，能夠容許各式各樣的知識，容許感性跟理性，包括各式各樣的認同在裏面，這些東西不是機械的並列，而是通過很有耐心很長期的一個對話，才能夠產生文諾一直強調的知識的有機性。我是非常慚愧的認識到，我聽了幾天文諾的演講後，我突然發現我在臺灣，我沒有搞過運動，或者是說我沒有搞過一件像樣的事情，因為我在臺灣很有幸所從事的幾件事情，要說稱得上有機性、整體性，我想它層次還是很低。所以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通過跟文諾的對談，我在想，我們的運動如何能整體的被建構出來，這個過程當中，我們如何的開闊我們的心胸，去跟各式各樣的知識、各式各樣的感性來進行對話。而且最為重要的一點，昨天文諾講的，他說他從甘地那邊領悟到的，我們可以想像我們就坐在一個教室，我們把所有的門窗都打開，讓各式各樣的風來吹拂我們，但是我們不要被它吹倒，這個各式各樣的風就是各式各樣的認同。他鼓勵我們去呼吸各式各樣的認同，保持一種跟各式各樣的認同對話的心胸，這樣才會建立一個知識的整體性跟有機性，這是我感謝文諾的地方，也是僅此幾句話跟各位朋友分享。希望各位朋友儘量跟文諾對話，謝謝。

**劉健芝：**

好！以下請文諾回答在場聽眾的問題。我收到一些問題，我先讀出幾個：BGVS跟印度其他的 NGO 組織有什麼區別？它在民眾與政府之間扮演什麼角色？

文諾：

BGVS 這個事業是一個運動，在印度，必須有很多人的參與才能稱之為運動。BGVS 是整體的社會運動中的一部分，在印度有非常多非常浩大的社會運動。區別 NGO 與運動是很困難的事情。在印度，一般來說，運動不會從基金會拿錢，運動必須要能夠自我生存，但 NGO 會從基金會拿錢。有時候我們會從政府拿錢，但是我們不會從基金會拿錢。有的像反水壩運動，完全不從政府和基金會等外部的資源拿錢。我們認為政府的錢是人民的錢，而不是那個政黨那個政客的錢，所以我們覺得用政府的經費是非常的自在。

我們跟政府的關係。印度有一位剛被謀殺的非常重要的工會領袖，曾經說過，他說最基本的運動，最基本的事情，是鬥爭與建設。鬥爭是你在反對共同的不公不義的時候會有那麼一個鬥爭，而在鬥爭中，你發現有共同的觀點、共同的想法的時候，我們可以建設一個共同的未來，這就是我們跟政府的關係。我們既跟政府合作，也跟政府抗爭。我們的很多工作是在國會裏面推動立法的改革，我現在就在參與推動一個立法活動。我們現在很努力的抗爭，要求政府的預算花一定的金額在基礎教育工作上面，這是一個全國性的抗爭。同時我們也反對印度與美國的核子協定，雖然這樣的一個協定並不像直接跟一般人有關係，但是我們也打造了這麼一個運動來反對它。

我們反對一個跨國公司，叫 Abbott。他們現在試圖壟斷愛滋病的用藥，如果是印度的制藥公司做治療愛滋病的藥，只需要一個人 2000 美元，就可以嘗試這個療程，但是 Abbott 的費用是一個人 5 萬美元。他們正在用各種方法，甚至用定購和立法來保障 Abbott 的壟斷，我們反對這樣的壟斷。我們的整個計畫，

有全球性的，也有地方性的，但是大部分的 NGO 並不是這個樣子的，大部分的 NGO 是拿一個一個計畫來申請經費，他們並不會把計畫放在一個大的全球性的層次上看。但對我們來說，我們對抗一個叫 Abbott 的跨國公司，跟我們和一個村的村民組織起來保護生計是同樣一個大計畫的一部分。總結來說，我們的運動，就是抗爭和建設聯繫在一起。

**劉健芝：**

我們繼續聽眾的提問。第一個問題是怎麼把科學和藝術聯合起來？第二個問題是如何面對印度的階級制度？

**文諾：**

科學跟藝術在知識的生產裏有一個共同的地方，都跟想像力有關。只不過在生產的產品裏面，他們是分開的。但是在心靈裏面他們是一樣的。我們重要的是去理解那個共同性，這樣我們改變我們的看法。在大學裏面，大學科學學科是被分開的，科學藝術是比較基本的，我們讀了一個科目以後就不會去關心另外一個科目的東西，這是我們的教育問題。所以重點的把不同的學問聯合在一起，看到他們相同的地方，對於小孩子來說，想像力在這個層次都是在一起的。像鮑羅·菲理的教育理論裏面，很有名的一個關於壓迫者的那麼一段教育，在 200 個小時裏面，可以把一個文盲的人訓練成一個識字的人，我們不教字母而是直接的教字，這個跟人的生活是很有緊密關係的。比如說土地跟人的生活很有關係，所以那個文字跟土地就很有關係，世界跟文字很有緊密的關係，我們如從他們的世界開始的話，他們閱讀文字的興趣就會很大。

關於階級的問題呢，我是比較驚訝有人知道這個階級的問題，這是一個很可

怕的問題，在 140 萬通過了掃盲運動的人裏面，42%是低階層的人，我們也有很低階層的志願者參與，因為印度的階級制度跟分工是很有關係的，所以我們要先質問分工的開始。

**劉健芝：**

問題:如果跟我們合作的那個地區的計畫是一味的破壞環境的話，我們如何去面對和解決這個問題？

**文諾：**

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首先我不認為傳統與現代的差別是正確的，我覺得這是一個很爛的分法。這個世界上有好事，也有壞事。我們應該分別好事和壞事，傳統與現代裏面都有好跟壞的東西，關鍵在於我們怎麼用我們的心智去分辨那些是好的部分，那些是壞的部分。我知道在大學裏面，有很多寫關於傳統與現代的對抗的東西，我覺得這些東西都是垃圾，雖然我不想冒犯任何人。保護地球是有人存在就一直有的傳統，如何跟自然相處，這當然是一個好的傳統。但是像種姓制度、父權制度等制度也是傳統的一部分，那是壞的傳統。我們反對這些，是不會有任何的問題的。但是一些傳統的農法，當我們今天面對生態問題的時候，仍然有很大的價值。同樣，我不認為現代都是壞的，比如說我認為現在的西方醫學體制有很大的問題，但是你不能否認現代西方醫學使得很多疾病得到控制。所以我認為，我們應該把傳統與現代的這些問題放進脈絡裏面，跟現實的問題結合起來看，所以我們不應該從概念裏面去贊成或者反對現代或者傳統。印度有一很大反科學的運動，在全球來說也是這樣，他們經常會引用甘地的說法，認為甘地開始了反科學運動，我不覺得這是一個好的辦法。

劉健芝：

問題：你剛剛提到的皮革加工場的合作社的產品如何跟大公司的產品在市場上競爭？

文諾：

對不起，我剛剛忘了回答一個問題，就是一個鄉村議會做一些不好的計畫的時候怎麼辦？鄉村議會不見得永遠都是做好事的，它們也會做一些愚蠢的事情。憲法是這樣規定的，上級議會可以否決下級議會的決定，所以在體制以內，當議會做了一些愚蠢的決定的時候，體制內依然有一個制衡的力量。我們的做法是，如果一個議會做了一些不明智的決定或者打算做不明智的決定的時候，我們會跟他們討論，在當地由一些志願者去跟他們討論。

關於制革工業，傳統製造軟皮革的技術對環境的污染是非常糟糕的，所以看到軟皮革，千萬要小心，不要因為看到它漂亮就去買。我們推廣的技術是用植物性的制革法，我們用樹皮做主要的原料，不會傷害土地，但是做出來的皮革並不像用砒做出來的皮革那麼軟。在我們推廣的合作社裏面，我們永遠使用的是植物性制革法，這樣的成品當然沒有辦法在大市場上跟那些軟皮革競爭，但是在當地市場是非常適合的。我們的想法是能夠自給自足，我們是為本地市場而做，這就是我們面對到矛盾的問題。我們很多的制革的社員會說，那我們用化學的辦法做就好了。但是我們說，那不行，你用了化學藥品，那你跟鄰近的農民的關係就搞壞了，但是那個關係可能比賺錢還重要。我們的原則是生產要對環境友善，生產要對勞工友善，生產必須要在全球的規模是正義的，我們生產的東西是生命所必需的，而不是生產那些不需要的東西，甘地曾說過，地球對人類生存所需要的東

西是完全足夠的，但對人類的貪婪是完全不夠的。我們生產的更多是好事，但是我們真的是因為需要還是因為貪婪而生產？有人說甘地有點傻，因為整個廣告工業就是讓人們的貪婪變成需要，所以我們必須回去認真的檢討，到底我們生產出來的東西那些是需要的。

**劉健芝：**

問題：在臺灣樂生療養院的案例裏面，政府站在發展與資本的那一邊，所以希望驅逐這些病患者。你談到你跟政府有一些合作的經驗，那你的政府站在反人民的那邊，然後使用暴力的時候，你要怎麼辦？

**文諾：**

我們面對政府的時候，最重要做的事情就是揭露各種各樣的資訊，因為大部分壞的決策或政策，都是在這些資訊沒有讓公眾知道的情況下做的。作為我們民眾科學運動重要的一個作用，就是把盡可能多的資訊向公眾披露。我們會把關於公共決策的資訊盡可能的披露出來，並不只是給政府知道，而是要給媒體、給公眾知道，然後讓人民自己來決策什麼是對我們好的決策，如果人民最後決定站在壞的決策那邊，我們也沒有辦法。兩年前，印度通過了一個資訊公開法，比如說政府要在什麼地方蓋一座橋，有這麼一個計畫，任何一個公民都可以付 10 盧比（大約 1/4 美元），政府就要把關於這座橋樑所有的檔案公開給你看。

**劉健芝：**

問題：在我的印象裏面，印度反水壩運動中，那些居民最後還是被驅離了，那麼在你的分析裏面，反水壩運動最正面的成果是什麼？

文諾：

事實上，納爾默達水壩最後還是被建了起來，然後很多人被驅逐了。但是事實上世界銀行在這個計畫中是被擊敗了的，他們必須要撤資，然後承認水壩的計畫是有失誤的，對於這個銀行支持全球各地水壩的建造有很重要的影響，讓它更謹慎的評估建設水壩的必要性。到現在為止，印度的大水壩建設多半都暫停下來。但事實上世界銀行不直接支持地方政府，他們支持中央政府。印度的 GDP 是每年 10% 增長，所以很多計畫並不需要世界銀行的資助，當地的經費就足夠做這些企劃。我們要做的就是停止世界銀行成為唯一一個提供知識的單位來制定印度的發展計畫。

劉健芝：

最後一個聽眾提問是，你身為印度人，你最值得驕傲的是什麼？

文諾：

首先要跟大家說明一點是，我喜歡我現在的國家，並不是我愛國，是因為印度是一個很瘋狂的地方。當然我也喜歡拉丁美洲，喜歡其他瘋狂的地方，我是一個很在地化的人，我喜歡我家鄉的食物，但我也喜歡中國菜。我並不是一個特別愛國的人，但是我很喜歡印度的古典音樂，但是我也喜歡聽京劇，我是從喀什米爾地區來的，我也很喜歡喀什米爾文。事實上並沒有一個單一的印度，喀什米爾跟其他的省份就不一樣，印度是個大陸，有多元的異種的文化。當然你也可以說拉丁美洲、中國也是多元文化的地方。你可以看到不同身份背景的人的互動，幾乎沒有任何問題的互動，這是一個很有趣的經驗。我必須要說那種民族國家的認

同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其他的認同必須要被強調，所以我覺得在全球各個地方都感覺像在家一樣。

**劉健芝：**

我們聽到了文諾博士關於民眾科學運動的一個非常精彩的介紹，但是這麼有活力的一個運動，國外媒體的報導是很少的。今天我們特別高興、也特別感激“天下”雜誌和“浩然基金會”舉辦這個演講，讓我們分享到這方面的經驗。我覺得我們對於文諾博士最好的回應，就是我們請他再來臺灣的時候，臺灣也有一個發展磅礴的民眾科學運動和基層民主運動。謝謝文諾博士！謝謝各位！

2007年8月14日錄音

2007年10月16日黃國良整理